

劍橋七傑 The Cambridge Seven



后排從左至右

查理·施達德 (Charles Studd, 1860-1931)

-富商之子，板球國手，運動明星，總是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。

章必成 (Montagu Beauchamp, 1860-1939)

-男爵之子，身材高大，富幽默感。

司米德 (Stanley Smith, 1861-1931)

-醫生之子，劍橋划船隊健將，能言善道，熱情洋溢。

前排從左至右

阿瑟·端納 (Arthur Polhill-Turner, 1863-1935)

-鄉紳之子，為人隨和，兩兄弟看來都屬於短小精幹的類型。

狄克遜·何斯德 (Dixon Hoste, 1861-1946)

-將軍之子，皇家砲兵軍官，沉默寡言，自律嚴格。

西瑟·端納 (Cecil Polhill-Turner, 1860-1938)

-杜西德：鄉紳之子，皇家騎兵軍官，較為固執。

威廉·凱巴 (William Cassels, 1858-1925)

-富商之子，英國國教牧師，個性成熟。

“我已撇下凡百事物，背起十架跟耶穌，世上福樂名利富貴，本已對我如糞土……”

一百二十年前「劍橋七傑」放棄他們在英國的顯赫家世、運動成就與炫麗前程，一起前往中國內地傳福音，此舉不但震撼了當時的英國社會，也寫下宣教史上動人的一頁。他們有的是全國著名的運動能手，有的是貴族，有的晉身為軍官，各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現。除何斯德外，都是劍橋大學的學生，而其中除杜西德中途轉學外，剩下五人都由劍橋大學畢業，因此得到「劍橋七傑」的稱號。但至終他們放下了世上的享受、今生的名利、美好的前途，而踏上一條艱辛的路——往遙遠的中國開荒布道。一八八五年二月他們動身來中國時，平均年齡大約是廿五歲，那真是一隻充滿青春活力的宣教隊伍。

縱然有人懷疑，有人諷刺，究竟他們怎樣和艱難的中文奮鬥，究竟在一個與基督教文化斷絕的國家，每天接觸著無知、迷信、拜偶像的人群，他們的虔誠能持續多久？但至終他們沒有一個人退後。

一八八五年五月二日，他們從倫敦遠赴中國的行動，大大震撼了那個時代，直至百年後的今天，他們的影響仍不稍減退。

施達德——板球手

查理·施達德 (C. T. Studd) 出生于貴冑之家，是劍橋的板球隊隊長。無論是打球、投球，在當時都是首屈一指的。投球方面，他更打破全國的記錄。

然而就是在他的板球如日方中的時候，他放下了板球，決心前赴中國傳揚主名。他的決定引起了大學的騷動，但他感悟到：“救贖意即‘買回來’，所以，如果我屬於他而還占著不屬於我的東西，那我就是賊；否則，我就該放棄一切而完全歸神。當我一想到耶穌基督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我為他放棄一切又有什么難呢？”

其實，施達德從未考慮過往海外宣教，他覺得英國已經夠大了，但當他清楚地明白神要他往中國時，他卻毫不猶豫，將板球的專誠全放到基督身上。

抵達中國后，他先后在太原府、上海、平陽、隆安府等地作傳道工作，并于一八八八年在天津跟另一位宣教士普絲麗·施德活小姐結婚，婚后四個小孩子也相繼在中國誕生。由于健康惡劣，施達德不得不在一八九四年舉家遷回英國，后來聖靈又催迫他往印度傳福音。至一九零八年，他正計劃重回印度，神卻奇妙地將非洲的需要放在他心上。

雖然施達德不是終生留在中國的工場，但他卻一生未離開過宣教的事奉。他開拓了非洲工場，且成立了環球福音差會，協助更多任務人往非洲禾場收割。

司米德——軟弱變為剛強

司米德（Stanley Smith）一直在中國北方工作，他可以用流利的中文講道。去世的前一天晚上，他還講道。1931年1月31日在蘇州逝世。

有誰料到這樣一位愛主、愛中國的宣教士，曾經是生活放蕩、靈性浮沉不定的軟弱基督徒？

他父親是著名外科醫生。司米德雖然十三歲已接受救主，但他一直陷于靈性的低潮。在劍橋念書的日子，他仍喜愛玩樂。雖然他熱愛草地网球、游泳、騎單車，還是划艇手，但他仍感到生活無聊，不滿足，覺得沒意思。他自認是個失敗的基督徒。直至他明白要將自己全交給主，他生命才有轉變。司米德很快就投入直接的事奉，一連串的露天聚會、下午茶點、醫院探訪、訪問貧民。他還得著新的負擔，就是到國外宣教。但不久他又再度軟弱，靈性總是暴漲暴落，忽上忽下。他肯定不會流失，但他完全沒有屬靈的能力，即使當牧師，也只是一個平庸的牧師。

在一次和弟兄的交通中，他發現他受自我意志的攔阻很大，他只喜愛基督徒的活動，但最后的方面，他仍想自己決定。于是當晚他在日記上寫上：“我必須把自己完全獻上。”

他本來可以留在劍橋或往紹德得理學院接受聖職人員的訓練，但最后他确定了中國是他一生的事奉，他也就義無反顧地踏上了！

西瑟·端納、阿瑟·端納兩兄弟

西瑟·端納（Cecil Polhill-Turner）排行第二，阿瑟·端納（Arthur Polhill-Turner）排行第三，他們也是富家子弟，父親是上校，按照當時的傳統，二子要當騎兵，三子則作家庭牧師。

阿瑟·端納雖然知道自己將來會當牧師，但他的生活絲毫不檢點，他愛賭馬，打牌，跳舞，直至在慕迪布道會中，他才真正決志。從此，他徹底與馬、牌、舞斷絕。他是校際運動的代表選手，他仍努力學習和運動，但他目的是藉此見證基督。在七

杰中，阿瑟·端納是第一個蒙召往中國的。他一直在四川傳福音，庚子拳變與辛亥革命期間，他都在中國。

二哥西瑟是騎兵軍官，又得過足球獎章，但他清楚 神并非要他穩步地爬上陸軍元帥的高位，而是要他前赴中國宣教。他的擺上并非受弟弟阿瑟影響，原來自從他獨自參加“中國宣教士聚會”后，他就決定去中國傳福音。曾有一位長老極力勸他留下，原因是騎兵隊很快就有機會遣往印度，在那里也可以作很多宣教工作。而他叔父白亨利伯爵也攔阻他，但西瑟毅然放下了升遷的機會，卻遠征中國山西，後來甚至深入西藏禁地。

何斯德——炮兵少尉

劍橋七杰中，只一個軍官，是炮兵少尉狄克遜·何斯德（P. E. Hoste），他受戴德生的影響很深。當他正考慮宣教工場的時候，戴德生寫的小冊子深深地感動了他：“中國三億八千五百万人民（這是當時的人口數目，現時是超過十億）在死蔭幽谷中，沒有機會接觸福音，回頭想想我們元帥的命令，‘往普天下去，把福音傳給萬民。’……面對成群走向滅亡的人，還能袖手旁觀嗎？”中國也開始成了他的負擔。

起先，當少將的父親對他往海外宣教加以很大的攔阻，但後來父親竟寫信告訴他，不再阻撓他，這令他更清楚 神的呼召。

戴德生曾向他強調遠赴中國的危險和孤獨，但何斯德毫不畏懼。想不到他後來還接續戴德生，作中國內地會的負責人。抗戰時，他曾被日人拘禁。他在中國住了六十多年，直至逝世前一年才離開中國，返回倫敦。

凱巴——牧師成為宣教士

威廉·凱巴（W. W. Cassels）在劍橋畢業不久，就成了英國國教副牧師，他在貧民中工作，然而 神讓他看見他的工場并非英國，而是遙遠的海外。自從他感到海外宣教的呼召后漸漸地清楚 神賜他的負擔是中國。

但他要往中國的決心，很快就受到考驗。他母親竟然親自找戴德生，請求他不要接受凱巴作宣教士，原來他母親有七個兒子，而凱巴是她唯一留在英國的兒子。結果是 神自己挪開了這些障礙，最后他母親竟寫信給戴德生：“這條路已夠艱難，如果我加以阻撓，那我不就成了 神好兒子的壞母親？…… 神已帶領他走上這條路，雖然不合我的意，但我須跟上，愿 神賜福他，也賜福你們的工作。”

凱巴先在上海，然后往中國西部，直至一九二五年逝世，都很少離開那里。

章必成——寧肯宣教，不要大筆財產

章必成不只放下了世上的享受，他更放棄了大筆財產。當他在中國宣教的時候，英倫的大哥，由于沒有兒子繼承業務，想給章必成大筆財產，但條件是要他放棄中國，放棄宣教，回英國打理房地產業，章必成毅然拒絕了。他宁愿鎮過鎮、村過村，艱辛地旅行布道。一次他甚至在炎熱的天氣中，和戴德生走了近一千里路。他愛中國的熱誠，甚至感動了兒子，後來兒子長大了，也加入中國內地會，而他自己也就是死于兒子的宣教站——中國寶寧。

章必成是大家庭中的三子，父親是男爵。自少他就在基督教活動和敬虔的氣氛中成長，但他卻徒有基督徒的外表而無屬靈的實質。在慕迪布道會真正信主后，他也曾一度軟弱。幸好，這只是短暫的情況，退后反倒叫他更邁向前，以后他更愛主！而神也就揀選了他完成他所托負的使命。

—

一八八五年二月四日晚上在倫敦愛塞特廳（Exeter Hall）的歡送晚會，雖然下著大雨，卻有幾千人到場，座無虛席。站在一幅中國大地圖前面，七個年輕人，一個接著一個講述他們蒙召的心聲。施達德用這段話作為結論：

你們是為今世而活呢？還是為永生而活？你們是注重世人的看法呢？還是神的看法？當有一天我們來到審判台前，人的看法對我們無足輕重，但神對我們的看法卻存到永遠。那麼，我們豈不是應該接受祂的話語，單單仰望祂嗎？

他們的豪情壯志，不但在英國和北美校園中掀起一股海外宣教旋風，也將中國內地會的聲望推向一個新的高峰。

絕不退卻後悔

「劍橋七傑」於一八八五年三月十八日抵達上海，然後轉往內地，有些人擔心他們只有五分鐘的熱度；一群養尊處優的富家子弟，遇上難學的中文、落後的环境、猜疑的人群，恐怕很快就會灰心後悔。事實卻是，他們後來雖然走不同的路線，卻沒有一個向後退卻，沒有一個覺得後悔。

司米德在山西工作，後來因教義上的問題離開內地會，但仍在山西另闢工場，直到一九三一年病逝。何斯德在中國的時間長達六十年，繼戴德生之後領導內地會，晚年遭日軍拘禁於集中營，回英國後去世。蓋士利長駐四川省，直到一九二五年過世。施達德在中國生活不到十年，後來轉往印度、非洲宣教，去世於非洲內地。在中國時，他繼承了一大筆的財產，卻全數奉獻給福音機構，一點也不為自己保留。章必成常陪同戴德生巡迴中國內地，一九一一年回英國。他的兒子後來也加入內地會，章必成多次回中國協助他，一九三九年病逝於他兒子位於四川寶寧的宣教站。杜西德的負擔是在藏族身上，他長期在青康藏高原活動，夫妻倆在一次暴亂中幾乎喪失性命。一九〇〇年回英國後，他的心仍在中國，後來又來了七次，而且

停留的時間一次比一次長。杜明德一直在四川傳福音，直到一九二八年退休回國，兩兄弟都在英國鄉間度過晚年。

推動宣教的手

在重溫「劍橋七傑」的故事時，我們不要忽略了他們的母親，其中有四位是寡母（蓋士利、施達德、章必成、杜氏兄弟），她們為了神的國度，犧牲了難以割捨的親情，實在令人感佩。以施達德的母親為例，她在知道么兒獻身中國的決定後，雖然還有其他兩個同樣是劍橋畢業生的兒子留在身旁，仍彷彿世界末日來到，陷入痛不欲生、歇斯底里的狀態中。然而施達德清楚確信這是神為他所安排的道路，就定意不為親情所動，堅持要往中國去。施媽媽只得讓步，轉而私下向內地會交涉，希望寶貝兒子到達中國內地時，已有精緻的餐具、舒適的沙發等著他，而金錢不是問題，施家可以負擔一切。她怎樣也料想不到，這個么兒不但不以生活設備為念，後來更將所繼承的巨額財產全數奉獻出去，自己甘願在非洲內陸過著最簡陋的生活。

幸好經過一陣子痛苦的煎熬後，施媽媽終於也順服神，成為一個以禱告支持兒子的母親，後來「劍橋七傑」親友們的定期禱告會就是在她的豪宅中舉行。

母親的手，是推動搖籃的手，也是推動宣教的手，「劍橋七傑」的母親們留下很好的榜樣。